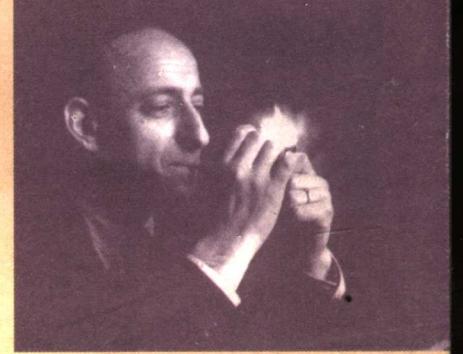


西
方
文
化
名
人
人
情



20世纪 迷惘的孩子们

LES ENFANTS PERDUS
DU XX^e SIECLE

[法] 弗雷德里克·戈森 著
吴岳添 译



旅

河南人民出版社

西方文化名人情感之旅



— 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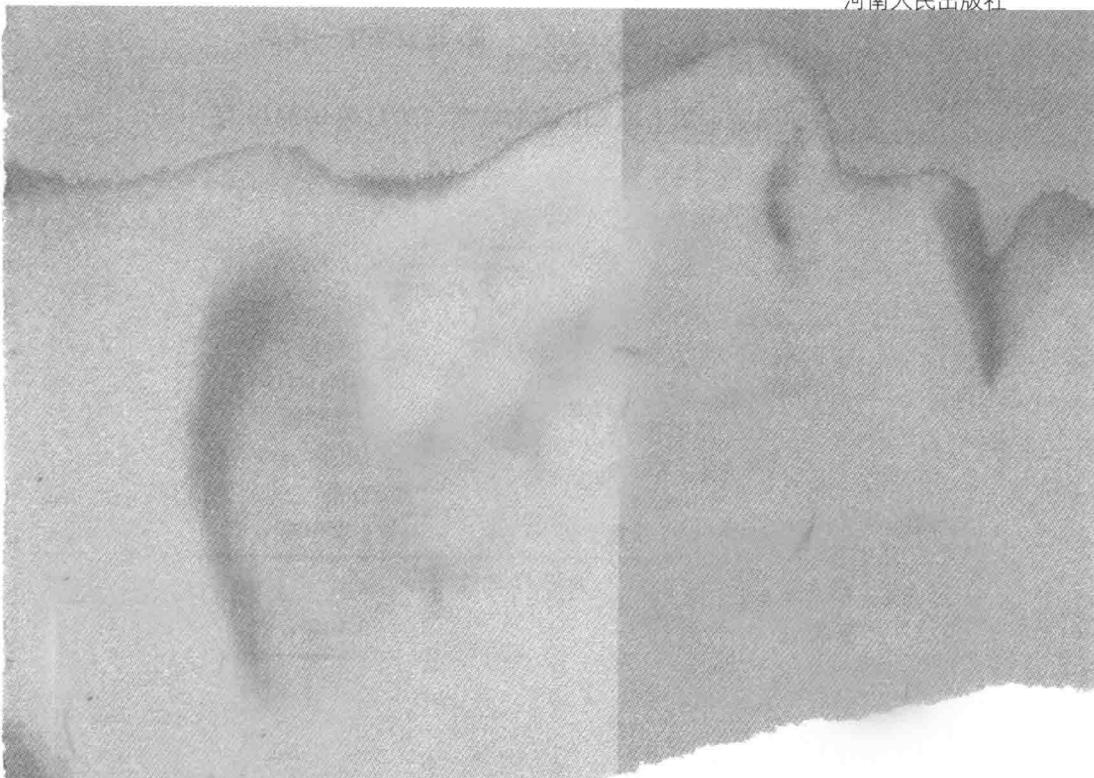
20世纪 迷惘的孩子们

LES ENFANTS PERDUS
DU XX^e SIÈCLE

[法] 弗雷德里克·戈森 著

吴岳添 译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图登字:图字 16 - 2002 -024

Les enfants perdus du xxè siècle par Frédéric GAUSSEN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20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迷惘的孩子们/(法)戈林(Gaussén,F.)著;
吴岳添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11
(西方文化名人情感之旅)
ISBN 7-215-05471-3

I. 2… II. ①戈…②吴… III. 传记文学—作品
集—法国—现代 IV. I565.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3419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5723341)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4.5

字数 107 千字 印数 1-5 000 册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2.00 元

目 录

| | |
|--------------------------------|-----|
| 导言：一些着迷的孩子 | 1 |
| 让一雅克·布鲁松与阿纳托尔·法朗士 被迷惑的秘书 | 7 |
| 吕西安·勒巴泰与夏尔·莫拉斯 犯上的法西斯主义者 | 27 |
| 莫里斯·萨克斯与让·科克托 被宽恕的流氓 | 44 |
| 勒内·克勒韦尔与安德烈·布勒东 绝对的超现实主义者 .. | 67 |
| 皮埃尔·埃尔巴尔与安德烈·纪德 拉弗卡迪奥在莫斯科 ... | 86 |
| 奥里维埃·托德与让一保尔·萨特 幻灭的记者 | 102 |
| 埃尔韦·吉贝尔与米歇尔·福柯 垂死的伴侣 | 115 |
| 结论 | 128 |
| 参考书目 | 131 |

导言：一些着迷的孩子

阿纳托尔·法朗士、夏尔·莫拉斯、让·科克托、安德烈·布勒东、安德烈·纪德、让—保尔·萨特、米歇尔·福柯……这些名字照耀着法国的20世纪。随着德雷福斯^①事件出现，最后消失在柏林墙的废墟中的“思想大师”们，使与他们同时代的人为之着迷。犹如善于想像和构思的庞大机器，他们把同时代的人引入了传奇般的精神冒险之中。小说、戏剧或诗歌、随笔、评论、内心日记、笔记通讯……其作品可谓层出不穷、源源不断。他们是通过“语言”、通过文章和演说来进行统治的。这些文人也是都市的演员，并非不乐于登台演讲。人们可以在讲台上和游行队伍里看到他们。他们也是咖啡馆和沙龙里的常客。他们讲起话来，言语的尖刻会使人们感到惊讶。他们算不上是演说家，音色往往带有鼻音，语流也时断时续。莫拉斯是个聋子，法朗士咬文嚼字，萨特和福柯有一种金属般的音色，听起来不大舒服。然而他们却能引人

^① 19世纪末，法国犹太籍上尉德雷福斯被诬陷为向德国出卖军事机密的叛徒，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从而使当时反犹太主义的民族主义浪潮大为加剧。这一事件把作家们和整个法国都分成了截然对立的两大阵营。以左拉和法朗士等为代表的德雷福斯派坚持正义，要求平反冤案，而以莫拉斯等为代表的反德雷福斯派则认为国家和军队是神圣的、不容怀疑的。

入胜。他们是讲故事的人，是魔法师。人们拥到卡亚菲夫人的家里，去聆听法朗士讲述他的件件逸事。科克托迷住了“屋顶牛”的常客，而萨特则使蒙巴拿斯^①的帕莱特的客人为他倾倒。他们既对所有的人讲话，也和每一个人交谈。他们的书籍向全人类说话，他们的信件则好像在吐露一种隐情，或者是一种迫切的命令，是写给那些在他们之后寻求生活意义的人看的。他们不满足于产生一些思想观念，他们体现着一个新的世界。这些良师是指路人、是启示者。他们在—个灾难时代的各个黑暗时期里涌现出来，就是为人们指明一条道路。他们总是在同心灵对话，但也在向肉体和梦想叙谈。他们想像着一个被解放的人，要让他走到他的欲望的尽头。他们拒绝人类环境的贫乏。他们愿意相信美、真、正义，相信人类和社会所可能有的进步，无论如何都相信希望在前。

飘荡在这个狂暴世纪里的战争阴影和堆堆尸体的气味，乃是构成这些重要的浪漫情结的背景。怎样逃脱灾难？通过艺术还是革命？理性还是疯狂？武器还是毒品？社会主义还是享乐主义？……解决的办法无关紧要，只要它是彻底的就行。生活不会分裂。政治和性欲却混为一体。法朗士歌颂肉体之爱，同时在为《人道报》撰写社论；纪德要求获得同性恋的权利，同时前往苏联；萨特与“海狸”^②一起，把一夫多妻制理论化，同时又在发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福柯为囚犯们呼吁，自己则常去毒品流通的施虐受虐狂们的同性恋夜总会……他们大概是对群众集会感到厌倦了。在他们看来行动首先是一场戏。1934年2月6日，当暴动者期待着莫拉斯的一个手势的时候，这位伟大的领头人，却退居到一个房间里，去用普罗旺斯方言写作一首诗篇……他向他的哑口无言的支持者们解释说，他的任务是用笔来揭露，而不是去点火。萨特的言

^① 巴黎16区的四个街区之一，是艺术活动的中心。

^② 指萨特的女伴、法国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1908—1986)。

词充满了火药味，而他却使法国的毛分子抛弃了恐怖主义。这些思想大师们提供了打开梦想之门的钥匙。他们借此指出有可能过另一种生活。他们是巫师。他们在重新学习梦想，正因为如此，人群才追随他们，比起自身的贫乏来更喜爱他们的幻想。

在整个世纪里，他们的影响巨大无比。一代接一代的人在他们身上认出了自己，因为他们是在向头脑和心灵说话。年轻人争相见到他们，敲他们的门，力求碰到他们的目光，向他们谈谈自己。对于被抛弃的年轻一代，这些大师也是父亲。这样就形成了一些把大师和弟子联结起来、具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父子关系和师徒关系的、充满了温情和诱惑的对子：这就是让—雅克·布鲁松与阿纳托尔·法朗士、吕西安·勒巴泰与莫拉斯、莫里斯·萨克斯与科克托、勒内·克勒韦尔与安德烈·布勒东、皮埃尔·埃尔巴尔与纪德、奥里维埃·托德与萨特、埃尔韦·吉贝尔与米歇尔·福柯……当然还可以举出其他许多名字，不过上述人士有一个特征：这些人的生平以这种师徒关系而著称，而且留下了这方面的记叙。秘书或合作者、心腹或朋友——甚至情侣……他们的相遇有时是偶然的，有时是出于年轻追求者的大胆举动，这种请求接见的热情足以破除一切障碍。建立起来的这种关系永远不会破裂。他们之间有一种完全的默契。开头都容易得惊人：年轻的追求者被大师的善意所感动。这些思想大师不是达官贵人。他们私下里的行为并不傲慢。他们简朴、认真、尽管任务繁重却惊人地无拘无束。他们耐心倾听，提出建议，给予帮助，就像对儿子说话一样。

这样他们就成了这些往往无家可归的年轻人前来寻找的父亲，其中许多年轻人来自外省：布鲁松来自尼姆，勒巴泰来自……莫拉斯^①（德龙省），埃尔巴尔来自敦刻尔克，吉贝尔来自拉罗舍勒。有几位（布鲁松、勒巴泰或萨克斯）在适于唤起同性恋的教会

^① 勒巴泰的家乡正好与他崇拜的大师同名。

学校里经历了严酷和挫折。他们是一些迷惘的孩子。萨克斯没有见过他的父亲；克勒韦尔目睹了父亲自杀；埃尔巴尔和托德是私生子；布鲁松出生时失去了母亲，仇恨他的父亲；勒巴泰和吉贝尔则看不起身为外省小资产者的双亲。但是并非只有他们这方面缺乏亲情。老师往往也是在当过经历过失望的儿子之后，才成了一个伤痕累累的父亲的。为了填补自身家庭的空虚，这些杰出的人物将身边的合作者和朋友，那些能够维持热情和愉快气氛，能防止他们最畏惧的衰老的年轻人组成了替代的家庭，因为青年是从事社会变革之人的完美的武器。

与老师们的关系中并非没有肉欲，它常常表现为同性恋。科克托与萨克斯、纪德与埃尔巴尔、福柯与吉贝尔之间的关系就不仅仅是精神上的。但是他们并不采取像夫妇那样确定的配偶形式。双方各自寻求的东西具有不同的性质。学生梦想的是一个生活的榜样，老师想要的是一种需要塑造的智慧。他们的共同之处则是文学。如此献身的年轻人本身都是词汇迷，他们梦想成为作家。而在老师那里，他们既会发现老师的艺术奥秘，也会看到其作品的素材。在他们看来，老师的作品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美，体现了思想和语言的完美。他们是来使自己与这些作品成为一体的。布鲁松随心所欲地充当法朗士，而法朗士也毫不犹豫地在这位秘书撰写的应景之作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流氓萨克斯能够惟妙惟肖地模仿科克托的字体，伪造他的信件和题词。然而影响并不限于模仿。思想大师不仅是一个知识的传播者，其本人也成了弟子的作品。他登上前台成为小说的人物。布鲁松笔下的法朗士、萨克斯笔下的科克托、托德笔下的萨特，或者在吉贝尔笔下成了“穆齐尔教授”的福柯，都不止是对他们进行的写生式的描绘，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其中，弟子把自己混同于自己的模特了。思想大师能够启示出这种对他自身的反映，这种才能并非微不足道。因为他是靠“语言”为生的，他并不怀疑他的责任就是培养对他信赖的年轻人。

作品。“写吧……”老师向其作品将会展现他的光辉的弟子说。

这些描绘属于一种独特的体裁。它们不是准确的自传。弟子离他们的模特太近，不适于写这样的自传。但是它们也不是过于乏味的报道。他们通常采用虚实相间的简短叙事的形式，或者在由于直接观察而会过于现实的描写中加入少量的虚构。他们的冷漠和讽刺往往令人惊讶。他们的意图不是要讨人喜欢。对于老师的惟一的责任就是真实：按原样描绘这样一个曾被他们如此崇拜的人，毫不掩饰使其显得伟大的种种弱点及其自相矛盾和言行不一的行为。这是一些人，而不是纪念碑。正因为如此才应该尊重和热爱他们。有人会指责弟子们的背叛，而他们并不隐讳这一点。大师们本身也要求他们这样做。这些人经历了挑战的一生，对于死后的同情只能是置之度外了。“在我死后，你可以随意描写我，”法朗士对布鲁松是这样说的。而纪德则对埃尔巴尔说：“一旦我死去，皮埃尔，损害我的名誉吧……。”吉贝尔就毫不犹豫地说出了福柯之死的秘密。弟子对老师的最好的敬意，就是对他们的体面迎头踢上最后一脚。

精神之父与生父一样，总有一天要离开。那个时刻来到了，老师的影子浓重，弟子明白这个影子正在把他研碎。分裂可以是温和的，像托德与萨特；也可以像萨克斯与科克托，尽管互相攻击却并不怀恨在心；布鲁松抛弃法朗士是痛苦的，而且伤口永远不会愈合；而勒巴泰在转向法西斯主义时向莫拉斯的穷追猛打这种决裂则是致命的。它可能像福柯与吉贝尔那样以双方一起死亡而告终。但无论结局如何，这段情缘却永远不会结束。在纪德、萨特或者福柯的葬礼上，埃尔巴尔、托德和吉贝尔感人地回到他们老师的遗体旁边：死亡并未将他们分离。他们在最后的时刻陪伴着他，握着他的手。布鲁松对阿纳托尔·法朗士给予自己的影响大为不满，然而他的整个一生都留下了老师的烙印。雷奥托认为是“法朗士迷惑了他”。20世纪的历史就是这些迷惑的历史。思想大师

们使这些年轻人偏离了航向，把他们拖入了自己的狂热之中。他们把自己的幻想作为那个时代的标志，帮助同时代的人来忍受当时的种种残酷行为。当他们退隐的时候，惟一留下的就是他们被后人忘恩负义抛弃的作品。现在还有人读法朗士的作品吗？还有人欣赏莫拉斯吗？从科克托或者纪德的作品里还能得到什么？人们会用什么尺度来评价萨特主义、福柯主义？不过让我们记住这些迷途的孩子头晕目眩的时刻，他们曾经相信这些奇迹，以至于因此失去了理智。他们向我们讲述的是一个幻想世纪的痛苦历程。

老师之死使弟子有点不知所措。尽管时间推移，但他所遭受的痛苦并未平息。在这样的情势控制下，要构思一部个人的作品并非易事。荣誉是难得碰在一起的。老师即使促使弟子去写作，他也在担心这种写作的成会不会使自己黯然失色。在大师们身边，弟子们始终只能是小一辈的助教。人们把他们看成是一些替身，他们也为此而痛苦。这种附属关系必然产生互动的反常行为。他们很想进行小小的报复、恶意的诽谤，甚至自杀性的自我嘲弄。这些被收留的孩子不是小圣徒。也轮到他们经历堕落、吸毒、消沉、最终的孤独，乃至监狱或收容所了。他们的结局可能是卑鄙的（萨克斯或勒巴泰）、悲惨的（埃尔巴尔或吉贝尔），但他们都是作家或杰出的记者。从亨利·德·儒弗内尔的《晨报》（布鲁松）到雅克·福韦的《世界报》（吉贝尔），从《法兰西行动》（勒巴泰）到《新观察家》（托德），包括具有文学趣味的杂志（从《新法兰西评论》到《现代》），凡是20世纪的大题目通过他们都蕴含有思想大师的“语言”。他们曾经是传承者，往往是不幸的、被诋毁和遗忘的接替者。但毕竟是多亏了他们，这种使那么多同代人得以梦想另一个不同世界的危险光芒得到传播。由于有过刻骨铭心的体验，他们比任何人都更体现了这个行将结束的世纪的巨大悲剧。

让一雅克·布鲁松与阿纳托尔·法朗士

被迷惑的秘书

1924年10月12日,法兰西为阿纳托尔·法朗士^①的去世而哭泣。这位法兰西学士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葬礼隆重而庄严。就在他诞生的、他的父亲开过书店的房屋旁边,在法兰西研究院前面,搭起了一个巨大的、用三色旗围绕的灵柩台。出席葬礼的有国家元首和政府成员,法定社团、外交使团和不计其数的民众。一个人类学专家打开了他的头盖骨,以便研究这位天才的大脑。对于整整一代人来说,阿纳托尔·法朗士既是法国最优秀的作家、善于保持语言纯洁性的人,又是从德雷福斯事件之后就指出了幸福之路的思想大师。阿纳托尔·法朗士是伏尔泰^②的继承者。当然,从1914年大战以后,法朗士不再是青年人的作家了。他优雅的怀疑主义不符合从战壕的故事里成长起来的、一代急躁的青年人的需要。后人把法兰西研究院的葬礼看成是超现实主义者们引起轰动的机会:他们推出了一本小册子《一具死尸》。布勒

① 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法国作家,192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小说《苔依丝》、《企鹅岛》和《诸神渴了》等。

②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代表作有《哲学通讯》和小说《天真汉》等。

东和他的朋友们写道：“为了把他的尸体放在里面，可以说是清空了河畔旧书摊的一整箱‘他多么热爱的’旧书，并把它们全都扔进了塞纳河。只剩下死亡来使这个人变成灰烬了……”不过当时超现实主义者只是一个由躁动不安的年轻人组成的小团体，他们的挑衅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与这个小册子不同，在葬礼之后不久出版的、布鲁松的《穿拖鞋的阿纳托尔·法朗士》^①却引起了轰动。这本书的出版立即激起了嘲笑和怒火。人们在书里看到的是这个私生活里的伟人，有他的弱点和怪癖，专心于他的微不足道的乐趣，而且嘲笑所有的人，而且在女管家和咄咄逼人的情妇，主持着奥什街沙龙的颇有名气的德·卡亚菲夫人的控制下生活。这是怀着自以为是的激情，利用经历的琐碎小事和轻浮逸事绘成的一幅大不敬的肖像。作品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几个星期之内就售出了10万册。

这个布鲁松并非无名之辈。他当时46岁，是个著名的记者，许多出版物上都有他的大名。他从《晨报》开始，先后为《精益求精》、《老实人报》和《吉尔·布拉斯报》等报刊撰稿，在《图卢兹快报》上主持着一个每日专栏。他是《文学新闻》的书评的负责人，因此很受作家们的敬畏。他被看成是一个好争执的人，他的含沙射影非常可怕。这本《穿拖鞋的阿纳托尔·法朗士》是他的第一本书（他在1910年译成法文的米斯特拉尔^②的《起源》不包括在内），而且他早就在期待着它的问世了。可这个见鬼的阿纳托尔·法朗士就是死不了，而布鲁松又曾经答应过在他生前不发表任何关于他的东西……这个秘密一直被严守不宣：要知道，他年轻时就成了阿纳托尔·法朗士的秘书，他对这本书的构思不会漏掉

^① 这个书名是直译，意思是指法朗士过着轻松舒适的生活，即描写法朗士不为人知的私生活。

^② 让·艾蒂安·米斯特拉尔（1830—1914），用奥克语写作的法国诗人，190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任何东西。这是一本记录！“把一份精美妙趣的手稿在漆黑的抽屉里暗藏了 15 年，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向报刊泄露任何信息，也没有在私下里与任何人通气，这对于一个文人来说是一桩惊人的成就。”让·德·皮埃弗在《辩论报》上这样赞叹不已。

这本书的成功很快就改变了作者的生活：他将永远是穿拖鞋的阿纳托尔·法朗士的人。这是法朗士第二次决定让·雅克·布鲁松的命运了。第一次要追溯到 1902 年，当时为了有助于《圣女贞德生平》的写作，他要找一个秘书，他的朋友亨利·莫诺德就向他推荐了一个来自家乡朗格多克的机灵的小资料员。他们从此开始了七年的师徒关系，而且很快超出了单纯的职业关系进而成为一种极为有成效的精神伙伴。

布鲁松 1878 年 9 月 20 日生于尼姆。他的父亲当过少校，后来行医。他的母亲生于尼姆与蒙彼利埃之间的小城索米耶尔，是一个“布商”的女儿。户籍官员在出生证上注明小布鲁松的名字是让。后来过了很久他才采用了让·雅克这个名字，这是阿纳托尔·法朗士为了向让·雅克·卢梭^①表示敬意而给他取的名字。他的一生开头就不好：母亲在生他的时候死去了。按照他的说法，他是父亲鳏居的祸因，所以父亲永远都不会真正原谅他，并觉得他非常碍事而把他交给奶妈去照料。小“雅努”的童年是在索米耶尔，也就是他外祖父母所在的城市里度过的。他在那里受到了泥瓦工的妻子、开了一个小杂货店的维亚拉夫人的细心照顾。他在整个一生中都对这个奶妈怀着一种至爱。“对我来说，世上没有人比她更必不可少的了。她赋予我智慧心灵的价值……”在前往阿根廷的船上，他在一个忧郁的晚上向阿纳托尔·法朗士这样承认。然而在他将近 6 岁的时候，他却突然和她分开了。他那当医

^①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代表作有《社会契约论》和小说《新爱洛伊丝》和《忏悔录》等。

JEAN-JACQUES
BROUSSON

LES
DAMES
DE
SAUVE



10

让·雅克·布鲁松

生的父亲有一天路过索米耶尔，医生“想起他在那里有一个儿子……”于是决定把他带回尼姆，使他受到与年龄相称的教育。这次离别之苦所造成的创伤，布鲁松在《索弗的夫人们》里像说动人的笑话那样叙述过。在索米耶尔，雅努像一个小农民那样过着乡村的生活。他只说那里的方言，在神庙的广场上和村里的小女孩一起玩。他处在一种完全纯洁的状态之中。而在尼姆，他必须学会文明化的生活：规规矩矩地坐在桌边，用一把叉子吃饭，使用手帕，穿一条长裤，尤其是应该讲法语，这一点迫使他沉默了好几个月。为了使他驯化，他被托付给了“索弗的夫人们”，那是由三个老处女开办的托儿所。后来他到尼姆的圣路易·德·贡扎格中学

去寄宿就读，在那里度过了几个忧郁的年头。中学毕业以后，他到图卢兹、接着到蒙彼利埃学习法律。他的父亲没能使他成为一个神甫，却希望看到他成为一个律师。可是他对司法毫无兴趣，只对历史和文学有兴趣。在修道士们那里学习的时候，他始终热情地阅读拉丁作家和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的作品。刚刚在尼姆注册为律师，他就跑到了巴黎，那是惟一能够醉心于文学的地方。布鲁松对在尼姆度过的童年保持着阴郁的回忆。他在家里是不幸的，因为这个接受了他的家庭并不爱他。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胆怯和娇弱的孩子，是全家人的出气筒，总是受到惩罚和粗暴的对待。他憎恨对他不理解和总是责骂他的父亲。可他的父亲真的是那么坏吗？这个为穷人行医的医生随时准备救助不幸的人，从他在城里的良好声誉来看，很可能并非如此。布鲁松医生是热诚的天主教徒，他对主教和村民、有产者和赤贫的人怀着同样的关爱。1913年4月10日的当地报纸《尼姆的吼声》上写道：“布鲁松医生是一位智者，一位温和、愉快、微笑的贤人，一位对最新式的治疗方法了如指掌、其旺盛的活力令人惊讶和困惑的老医生。”仅此而已！这种给予当地所有人的仁慈善意，在他的家门口便停止了。据他的儿子说，他遵循“箴言里的国王的教诲”：“对你的孩子不要节省鞭子。”除了养育后代之外，他的头脑里还有着别的忧虑。布鲁松解释说，一旦成了鳏夫，父亲就与……他的城市再婚了。他成了城市的保护人，而整个城市的人都崇拜他。正因为如此布鲁松憎恨尼姆这个后母，这个他“出生的和必然带来不幸的”城市，他回到这里总是非常勉强。“对于这座我诞生的、天主教胡格诺派^①的城市，我始终有一种恐惧……当我走过这条通向普拉迪埃^②雕塑的古老的水泉女神的、宽度增加了五倍的大道时，我又发现了童年时哆嗦的灵

① 16—18世纪宗教战争时期法国天主教徒对基督教加尔文派教徒的蔑称。

② 让·雅克·普拉迪埃(1792—1852)，法国雕塑家，擅长表现女性美。

魂。”他童年的美妙时刻就是他能够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准许他回到索米耶尔的奶奶那里去，或者被打发到塞文山脉的乡村神甫或牧羊人那里去度假。

这个外省的年轻人来到了巴黎，“带着少许蹩脚的文凭和手稿”。“在期待着出版商和荣誉的同时，他在塞尔邦特街的一个屋檐下，依靠在图书馆里为醉心于考古学的社交界人士进行研究而勉强度日。”让他工作的是一位“胡格诺派的高级官员，雇佣他的目的是让他从事关于圣巴泰勒米惨案的研究”。^①有一天，这个好心人告诉他，明天阿纳托尔·法朗士在等着他去，因为需要一个人来协助写作《圣女贞德生平》。年轻人惊呆了。他对当代文学一无所知，在修道士那里学过的作家几乎没有是法国大革命以后的。幸好有一个例外：“他知道法朗士，因为这是最后一个古典主义的作家。”他忐忑不安，步行穿过巴黎，来到了福熙大道^②边上的萨伊德别墅。这一天是接待日，屋里挤满了来访的人。主人坐在一把哥特式的安乐椅里，“穿着睡袍，毡制的拖鞋，丝绸的短裤”。人人都在高谈阔论。这位大作家漫不经心地谈着各种各样的话题。年轻的乡巴佬目瞪口呆地注视着这幕情景。当接见结束的时候，他走了，连说一句话的机会都没有。当他回到自己家里的时候，他发现桌子上有一封阿纳托尔·法朗士的气压传送信，对他的缺席表示惊讶。这一次他疾走如飞地返回萨伊德别墅。“主人在图书馆里接待他。一次小小的盘问。”

“您为那位先生编撰资料挣多少钱？”

“一点钱都没有。”

“我给您双倍的工资。”

^① 1572年8月24日(圣巴泰勒米节)，天主教在巴黎突然武装袭击胡格诺派，致使该派2000余人丧生。

^② 以法国元帅费迪南·福熙(1851—1929)命名的街道。

从这一天开始了最终决定着布鲁松一生的经历，不过阿纳托尔·法朗士对他也很感兴趣。

在 1902 年，法朗士是法国精神生活中的一座丰碑。他 54 岁，正处于文学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德雷福斯事件的斗争已经平息，他的思考扩展到了政治和历史。他在与现实更加保持距离的同时，越来越站在社会主义者一边。他忙于写作《圣女贞德生平》这本总也写不完的书。在私生活方面，他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着热情的卡亚菲夫人才获得了在社交界的地位，但是这种关系已经开始使他感到压抑。法朗士厌倦了。他的名声如日中天，他为此感到骄傲。可是名声也给他带来了一些使他不快的义务。对他的各种请求从不间断。要写文章和序言，准备讲演，接待表示敬意的来访，制订旅行计划。这些敬意使爱好虚荣的法朗士感到愉快，不过他也是个漫不经心的人，这么忙碌实在难以忍受。他喜欢在码头上散步，到旧书商和古玩商那里逛逛，向女商贩献献殷勤，让自己放松一下。布鲁松的到来正好能使他散散心。法朗士很快就被他那种南方人的热情、饶舌、大胆，以及他的修养和精神上无休止的好奇心所吸引。布鲁松立刻就明白应该怎样来征服这位大人物：奉承他、讨好他、逗他开心、听他讲话、让他讲下去、不要惹他生气，必须永远都有故事讲给他听。他们相互欣赏。他们有那么多的共同之处，首先来自取之不尽的文学源泉。“和阿纳托尔·法朗士谈了不到十分钟，我们就像双颈诗琴和诗琴^①那样和谐一致了。我们有着相同的知识、相同的怪癖、相同的见证……他兴高采烈：‘我等着您，我的孩子。您是为我而生的，在安托兰们^②和自古以来的城市里……’”在读《穿拖鞋的阿纳托尔·法朗士》和它的续集《从巴黎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历程》的时候，我们知道这种默契

^① 16 至 17 世纪在欧洲流行的两种弦乐器。

^② 96 至 192 年古罗马七位皇帝的总称。